

# 从“信仰中国”到 “信仰周边”

——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宗教互动\*

● 徐以骅

[内容提要] 近年来笔者及其研究团队相继提出了关于宗教与中国对外民间交流和公共外交的一系列概念和分析框架,其中就包括“信仰中国”和“信仰周边”。本文主要通过讨论“信仰中国”与“信仰周边”的关系,来进一步分析和反思我国宗教和宗教团体在周边外交中的作用。

[关键词] 信仰中国 信仰周边 宗教民间交流  
公共外交 大国宗教

近年来,随着中国对外交流的深入开展,宗教和宗教团体作为我国对外交流的载体也日益受到重视。中国宗教“走出去”、宗教与中国对外战略、宗教公共外交、宗教与“一带一路”等开始成为热门课题,受到政、教、学三界乃至整个

---

\* 本文的初稿曾宣读于2017年4月9日在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芒市召开的第二届南传佛教高峰论坛。

社会的关注，宗教团体的对外交流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领域已成为中国全方位“走出去战略”和公共外交的一道独特风景线。<sup>①</sup>

宗教与中国对外民间交流和公共外交一直是笔者所在研究团队的学术关注点之一，为此我们提出了与相关的一系列概念和分析框架，其中就包括“信仰中国”和“信仰周边”。本文简要讨论“信仰中国”与“信仰周边”的关系，并以此来进一步分析和反思我国宗教和宗教团体在我国周边地区外交中的作用。

### 一、“信仰中国”与“信仰周边”的提出

“信仰中国”概念是笔者在2011年发表的《全球化时代的宗教与国际关系》一文中提出的。该文这样写道，“与全球性‘中国经济圈’和‘文化中国’并存且作为其价值观和机构性基础的‘宗教中国’或‘信仰中国’正在不断增长。”<sup>②</sup>“信仰中国”的思想来源有三：一是美国社会主义者迈凯耳·哈林顿的著作《另一个美国（美国的贫困）》<sup>③</sup>，作者在该书中揭露了在所谓“丰裕社会”的美国存在的大量贫困现象，是20世纪80年代我国美国史专业研究生的必读书之一；二是温斯顿·邱

① 可参见徐以骅、邹磊主编：《宗教与中国对外战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蒋坚永、徐以骅主编：《中国宗教走出去战略论集》，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6年版。

② 《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9期，第18页。“信仰中国”可译为“Believing China”或“Faith China”。

③ 该书中文版1963年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吉尔二次大战后关于英国“三环外交”的对外战略论述<sup>①</sup>；三是哈佛学者杜维明的“文化中国”<sup>②</sup>。当然我们借鉴的主要是论述框架，旨趣和内容与上述论述均有很大不同。

2012年1月笔者与邹磊合作发表了《信仰中国》<sup>③</sup>一文，对“信仰中国”做了较全面的论述。该文指出，国内宗教发展、跨国宗教交流与国家总体外交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已逐渐成为中国和平发展进程中具有全局性意义且亟需面对的战略问题。中国在宗教信仰领域更加有所作为的关键，即在于正视一个逐渐浮现的、与“文化中国”和“中华经济圈”并存的“信仰中国”。

“信仰中国”包含三个紧密相连的“信仰板块”：（1）中国大陆与港、澳、台；（2）中国传统宗教信仰与各种东西方宗教的海外华人信众群体；（3）中国传统宗教信仰的外国信众群体。我们认为，中国国家力量对“信仰中国”的积极叙述、塑造与展示，不仅将为民族复兴提供坚实的价值支撑，也将从国家安全、经济发展、国际形象、国家统一等四个方面对中国国家主权和利益的维护和实现产生积极意义。

① “三环外交”是英国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提出的英国在二次大战后初期的外交战略。1948年10月9日，丘吉尔在保守党的年会上抛出了其“三环外交”方针，其中第一环包括英联邦和英帝国殖民体系；第二环包括英、美、加和其他英联邦国家的所谓英语世界；第三环是联合起来的欧洲。该外交战略旨在通过英国在与美国、英联邦和欧洲这三个环节中的特殊联系和地位来维护英国的传统利益和大国地位。

② 20世纪80年代末杜维明先生提出不仅要政治、经济、社会角度，而且要从文化角度来看中国或中华民族，把中国和海外华人世界重新想象或建构为一个整体。根据此种“大中华叙事”，“文化中国”由三个意义世界（symbolic universes）构成：1. 中国大陆、港澳台地区及新加坡；2. 世界各地的海外华人社群；3. 各国关心中国文化的知识群体（学者、媒体人、企业家、政府官员等）。关于“文化中国”与“信仰中国”的关系，参见徐以骅、邹磊：《信仰中国》，载《国际问题研究》，2012年第1期，第49—54页。

③ 同上，第43—58页。

与“信仰中国”密切相关的，是“信仰周边”<sup>①</sup>。2017年4月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研究生李沁园在“信仰中国”的基础上，提出了“信仰周边”的概念，指出由于宗教尤其是佛教在中国一些周边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并且在一些国家为全民性信仰，因此“如何发挥中国宗教在对外民间交流中的积极作用，运用宗教关系改善相互认知，为国家间关系的发展夯实民意基础，营造友好氛围，成为构建我国周边秩序的一个重大课题”。<sup>②</sup>

从中国的视角出发，“信仰周边”事实上早已存在。我国传统宗教和民间信仰对周边国家和地区的长期辐射和历史交往构成了“信仰周边”的宗教基础，地区及双边关系的积极发展和良好互动为“信仰周边”建立了政治基础，而当代中国包括佛舍利外交、“佛教黄金纽带”外交在内的跨地区、跨民族和跨文化宗教交流则为对接“信仰周边”的具体实践。

“信仰中国”与“信仰周边”有着密切的关系。首先，与政治和经济等领域一样，“信仰中国”与“信仰周边”是互为表里的或者说互为对方的周边，是一种互动平等而非主次从属的关系；其次，作为与中国传统佛道教和民间信仰关系最为密切以及海外华侨华人最多的地区，“信仰周边”是“信仰中国”海外板块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和海外投射力最强的区域；再次，“信仰周边”与“信仰中国”拥有共同或重叠的宗教信仰，一些中国传统宗教和民间信仰业已成为一些周边国家宗教信仰体系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形成了某种共生共荣的“宗教共同

① “信仰周边”可译为“Believing Peripheries”或“Faith Peripheries”。

② 李沁园：《当代中国佛舍利外交与“信仰周边”的构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学院国际关系专业硕士论文，2017年5月。该论文主要通过对中国与缅甸、泰国、斯里兰卡、韩国、日本等国佛舍利外交的比较研究，来讨论宗教在我国周边外交中的作用。

体”。总之，如果不能经营好与“信仰周边”的关系，“信仰中国”便无从谈起，而宗教文化在我国周边外交中的积极作用当然也更无从谈起；同样如果不能经营好“信仰周边”，那么我国也较难妥善处理好与占世界绝大多数人口并且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历了爆发性增长的所谓“信仰世界”<sup>①</sup>的关系。

## 二、“信仰周边”的意义

我国周边国家有狭广两义：狭义的周边国家指与我国山水相连的14个陆上邻国（即朝鲜、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锡金、不丹、缅甸、老挝、越南）和隔海相望的6个海上邻国（韩国、日本、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印度尼西亚）。广义的周边国家或“大周边国家”则涵盖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和南太平洋六大地理板块。如果对“信仰周边”作了初步界定的话，那么“信仰周边”主要指我国周边国家尤其是狭义周边国家宗教信仰的总体格局和存在方式，以及我国与这些国家以宗教信仰为基础和纽带的交流和互动关系。

如果将周边国家或大周边国家宗教图谱与中国传统宗教（主要是佛教）和民间信仰的分布格局叠加起来，我们不难发现“信仰周边”的重点板块和国家依次为东南亚（包括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东北亚（包括日本、韩国、蒙古）和南亚（包括斯里兰卡、尼泊尔）。“信仰周边”的重点板块也是“信仰中国”的海外核心板块，在某些

<sup>①</sup> 可译为 world of faith 或 faith world。

地区或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信仰中国”的海外延伸。如果把我国建制宗教（五大宗教）、非建制宗教（包括犹太教、东正教、巴哈伊教、摩尔门教）和民间信仰全部加起来，那么中国与周边六大地理板块在宗教领域都具有不同程度的交集和相当频繁的交往。宗教不仅是中国民间对外交往和公共外交的先行者，<sup>①</sup>而且是中国对外关系中最广涵和最持久的因素之一。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中国一直重视妥善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并且一直在探索基于国家平等与和平共处的周边区域观。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实现了与所有邻国关系的正常化，成为邻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并且提出了“与邻为善、以邻为伴”以及“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交方针。经过多年的外交实践，周边外交已成为当前我国外交的“首要”任务。

然而，随着中国快速崛起尤其经济影响力的日益显著，中国周边尤其是亚太地区逐渐形成了经济上倚重中国、安全上倚重美国的经济—安全二元国际关系格局。周边一些国家既从中国的发展中获益，但又对中国快速崛起感到不安和疑惧，未把与中国的安全合作作为增进本国国家安全的选项，试图借助外部大国力量来“制衡”中国，甚至不惜挑起与中国的领土主权争端。而我国在发挥区域乃至全球性经济影响力的同时，未能有效和全方位地向周边国家提供安全和文化公共产品。显然中国需要建构一种更全面和平衡的周边外交战略，以弥合本国影响力在经济与政治及安全之间、在硬实力与软实力之间，以及在周边国家精英和基层民众之间所存在的多重差距及战略互信的缺口。鉴于宗教在周边地区的广泛覆盖面和重要性，在

<sup>①</sup> 参见卓新平：《“走出去”文化战略与中国宗教的先行作用》，载蒋坚永、徐以骅主编：《中国宗教走出去战略论集》，第1—7页。

一些国家和地区还具有民族性和全民性，“信仰周边”确实有必要成为中国周边外交的一项重要考量。

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周边外交给予了异乎寻常的高度重视。2013年是我国周边外交发生重大调整的一年，该年10月24—25日召开的中央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标志着中国周边外交工作目标的升级，即从周边稳定与区域合作提升至建设“命运共同体”的高度。<sup>①</sup> 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指出中国在处理周边外交问题上的工作应做到“亲、诚、惠、容”，“要坚持睦邻友好、守望相助；讲平等、重感情；常见面，多走动；多做得人心、暖人心的事，使周边国家对我们更有善、更亲近、更认同、更支持，增强亲和力、感召力、影响力。”具体而言，经济上应“使我国发展更多惠及周边国家，实现共同发展”，安全上“推进区域安全合作”和“增进战略互信”，人文领域实现“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关系亲不亲，关键在民心”，宗教在“巩固和扩大我国同周边国家关系长远发展的社会和民意基础”的民心工程中，显然扮演着十分重要甚至是不可或缺的角色。

如前所述，“信仰中国”在构建国家安全的隐性防线、提供中国经济发展的持续保障、正面塑造中国的国际形象，以及维护中国国家统一的精神纽带等四个方面服务于国家整体对外战略。经营好与“信仰中国”有各种交集的“信仰周边”关系也具有同样的目标。国家安全不仅指免除重大安全威胁的要求，更指国家免除重大安全威胁的能力。“信仰中国”和“信仰周

<sup>①</sup> 《习近平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2013年10月25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3/1025/c1024-23332318.html>（登录时间：2017年5月1日）。

边”一样，都是采取在宗教领域的积极安全和积极和平的策略，<sup>①</sup>来构建和维护中国周边的安全与和平，从而使宗教对外交流和公共外交成为我国努力推动区域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

### 三、“信仰中国”和“信仰周边”的局限

一个国家的宗教海外辐射力主要有硬件和软件两方面构成。硬件包括圣地/圣物、宗教人口、传教和宗教非政府组织、宗教神学院校、宗教传媒等；软件则包括政教关系、宗教政策和实践、宗教和神学思想、宗教的社会受尊重度，以及具有超凡魅力和创业精神的宗教领袖等。当然一国的海外宗教辐射力大小也往往反映了该国综合国力的强弱。“大国宗教”在国际舞台上具有十分明显的优势地位。

一国宗教的海外辐射力还与其对外来宗教的包容、吸纳和改造程度及能力有关。我国唐代对域外各种宗教的兼容并蓄，造就了“充分而有光辉”的盛唐气象；美国对外来宗教尤其是移民宗教最广泛的接纳和美国化改造，也是美国宗教海外辐射力经久不衰的原因之一。因此一国的宗教海外辐射力在很大程度上是与该国对外来宗教的包容力、吸纳力和改造力成正比的，而对外来宗教的包容、吸纳和本国化改造也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宗教软实力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

<sup>①</sup> 安全与和平均有消极和积极之分。消极安全具有被动和防御性，主要着眼于消除安全威胁；积极安全则具有主动和进取性，着眼于预防安全隐患以及扩大安全的空间和手段。同样，消极和平指反对使用暴力和避免遭受暴力；而积极和平则指通过各种途径和机制来创造和维护和平。

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大幅提高，中国宗教的海外辐射力有较大提升，但“信仰中国”对接“信仰周边”仍有明显的局限性和不对称性，在很大程度上仍是愿景而非现实。“信仰周边”固然是“信仰中国”最核心的海外板块，但也是对“信仰中国”海外影响力和辐射力的挑战和考验。

首先，作为官方意识形态为无神论的国家，中国的弱宗教性决定了宗教和宗教团体在我国对外关系中只能扮演辅助和次要角色。因此宗教与我国对外政策尤其是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关系主要在提升我国处理国际宗教事务的能力，不可能借鉴和遵循宗教在很大程度上参与外交事务以及为对外扩张提供合法性依据的美国模式。由于中外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和政教体制的差异，中国当代宗教政策和实践是一个较难讲述的故事，而中国政教模式和宗教政策的国际说服力、吸引力以及宗教中国化的水准均有待提高。<sup>①</sup>

其次，除了信徒人数和圣地/圣物拥有量占据较大优势的佛教、道教和民间信仰外，中国与“信仰周边”实际上还存在着较大的交流赤字，并且除了超大型庆典式宗教活动外，中国宗教海外投射力所依据的软硬件基础设施，无论是传教和宗教非政府组织、宗教传媒，还是宗教/神学思想和宗教领袖，均存在较大缺口。即使就佛教而言，大陆汉传佛教虽具有“大国宗教”的优势，但在佛学教育、佛学研究、海外弘法和道场分布格局等方面与其他东南亚国家或我国台湾地区的佛教团体相比并不占优。在亚伯拉罕诸教尤其是当前对国际社会影响最大的“三大跨国宗教运动”<sup>②</sup>即伊斯兰教、基督教福音派和罗马天主教方

① 徐以骅：《中国宗教“走出去”的机遇和挑战》，第13页。

② Thomas F. Farr, *World of Faith and Freedom: Why International Religious Liberty is Vital to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2008), pp. 37 - 38.

面，我国与周边地区则存在很大的交流逆差。更有甚者，“信仰周边”存在着各种政教间和宗教间冲突，其部分地区还是海外三股势力的发源和聚集地，对中国国家安全构成直接威胁。因此除我国汉传佛教、道教和民间信仰外，就宗教而言中国在大多数周边地区实际上并不具备郑筱筠教授所说的“区位优势”，这在我国大周边地区更是如此。

第三，由于目前我国各领域的非政府组织尚处于培育和成长阶段，在运用宗教因素开展的民间对外交流和公共外交活动中，政府的作用仍比较突出，宗教团体的主体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与此同时，某些民间或非建制宗教团体所发动和参与的对外宗教活动，因基于强烈宣教而非交流动机、严重缺乏神学和跨文化交流训练，又置身于宗教/民族矛盾深刻、恐怖主义高发的地区，这非但无助于改善我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反而引起所到和所在国政府和宗教群体的高度关注和对立情绪，严重损害中国政府的国际形象，并危及“一带一路”建设的顺利开展。此外，中国宗教团体在国际关系舞台上的活动能力、调解能力和推动“积极和平”的能力和经验均有不足，这也成为限制其在“信仰周边”发挥更大作用的障碍。<sup>①</sup>

总之，要实现“信仰中国”与“信仰周边”的良性互动，进而实现宗教与中国对外关系目标的对接，中国的政、教、学三界仍任重道远。对实现上述目标，我们对以下几点应有充分的认识和推进：（1）作为民间对外交流和公共外交的载体，宗教已然成为各国外交工具箱里的最新工具。然而宗教虽可以用作外交政策工具，但切忌“工具化”和“泡沫化”。宗教对外交流的特点就是水到渠成、润物无声；循序渐进、量力而为；

<sup>①</sup> 徐以骅：《拆墙搭桥——宗教对话在中国》，载《中国宗教》，2016年第7期。

固本强基、行稳致远；切忌急功近利，拔苗助长；（2）我国宗教团体应发挥在宗教对外交流中的主体性作用，对外交流模式应实现从自上而下到自下而上模式或从等级制向扁平化模式的转变；（3）“信仰中国”对接“信仰周边”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性，我国宗教民间交流和公共外交需突出重点、扬长避短、精细谋划，分片经营，尽快实现从重形式到重内容、从粗放到深耕、从短线操作到长期使命的转变；（4）加强我国宗教团体的软硬件建设，提高宗教的社会受尊重度，内修外达，广结善缘，惠及周边，造福天下。

本辑大致分为美国宗教、宗教与国际关系、宗教史等三个栏目。本辑的主办单位为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和上海高校智库复旦大学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中心。上海高校智库复旦大学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中心的博士后段世磊、谢子卿、王佳尼博士以及中心学术助理刘倩洁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编辑工作。在此一并致谢。

## 著（译）者简介

**肯尼斯·沃尔德 (Kenneth Wald)**

美国佛罗里达大学政治学杰出教授

**阿利森·卡尔洪—布朗 (Allison Calhoun-Brown)**

美国佐治亚州立大学政治学教授

**阿兰·鲍尔 (Alain Bauer)**

法国国立科学技术与管理学院犯罪学教授、  
上海高校智库复旦大学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  
研究中心客座教授

**格扎维埃·罗费尔 (Xavier Raufer)**

法国巴黎第二大学犯罪学教授、上海高校  
智库复旦大学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中  
心客座教授

**徐以骅**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国际关系与公共  
事务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上海高校智库  
复旦大学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中心  
主任

**钮松**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研究员、上  
海高校智库复旦大学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  
研究中心研究员

**章志萍**

海军军医大学外语教研室副教授、上海高  
校智库复旦大学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  
中心研究员

## 主编简介：

徐以骅，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宗教系哲学博士、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政治系主任、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主任；上海高校智库复旦大学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国家社科基金学科组评审专家、国家宗教事务局宗教工作专家库特聘专家、金陵协和神学院院董等职；上海市政协委员。研究方向包括宗教与国际关系、宗教与中国社会、中国基督教史、美国宗教等。创办并主编学术丛刊《宗教与美国社会》《基督教学术》（与张庆熊共同主编）、《宗教与当代国际关系论丛》以及《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战略论丛》。

感谢关注时事出版社



时事出版社  
官方网站



时事出版社  
官方微信公众号